

论电视新闻的叙事困境

欧阳照

(重庆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电视新闻叙事化发展趋向与电视新闻固有的新闻属性及电视传播特性产生潜在冲突,从而使电视新闻面临叙事困境。文章试从3个层面入手分析:一是符号层面,探讨叙述声音与场景呈现的冲突;二是文本层面,解析现代神话与原型话语的冲突;三是机制层面,论述社会职责与消费逻辑的冲突。

关键词:叙事化发展趋向;电视新闻;潜在冲突

中图分类号:D73/7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0)05-0122-07

讲述故事和倾听故事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直绵延不绝的交流活动,从《荷马史诗》、《史记》的时代到今天,人类对叙事有着永恒的心理需求。在英语里,新闻往往被称为 Story,在西方媒体从业者看来,报道新闻实质上就是在讲故事。自1833年美国的《太阳报》开创大众化报纸时代以来,情节曲折、富有人情味的新闻一直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无论传播技术和现代媒体如何发展,传统新闻学的那些核心的东西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新闻学的根基和核心是一门讲故事的艺术和学问”^{[1]P19}。作为现代人认知周遭世界、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电视新闻叙事化趋向日益显著,无论是专题类、谈话类还是消息类,甚至是最为传统规范的电视新闻播报栏目无不受到叙事化浪潮的巨大影响:或强调情节曲折,或渲染情感伦理,或突出娱乐元素,各出奇招。电视新闻日渐偏离了传统的告知信息、监测环境的职责定位,“故事性”已经成为新闻选择、加工的重要标准。

不可否认,电视新闻叙事化在拉动收视率、丰富新闻表现手法方面功不可没,这也使得对电视新闻的叙事学研究从电视业界到新闻学界都是引人瞩目的焦点话题。然而,许多相关论述往往集中于对电视新闻叙事表面技巧的探讨。事实上,由于电视新闻必然要受到固有的新闻属性以及电视传播特性的种种制约,叙事化趋向带给电视新闻的影响绝不仅只在于形式上的一些变化,更重要的是形成了电视新闻不可避免的叙事困境。

一、符号层面:叙述声音与场景呈现的冲突

叙述声音是叙事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不同于一般意义上作为形式元素的“声音”,它与话语相伴相生,是叙事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叙述者语气或价值观的变化而变化,用以影响读者对人物和事件的反应和理解。简言之,叙述声音是“文体、语气和价值观的融合”^{[2]P20}。我们知道,新闻报道绝不是对现实事件“镜像式”的机械反映,它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从业者的评判立场和价值取

收稿日期:2009-12-23

基金项目:重庆大学2008年青年教师创新能力培育基金项目“电视新闻叙事策略研究”(CDCX011)

作者简介:欧阳照(1973-),女,重庆璧山人,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新闻理论及电视文化研究。

欢迎访问重庆大学期刊社 <http://qks.cqu.edu.cn>

向。在电视新闻叙事中,叙述声音主要体现在叙述者经过精心组织的话语之中,叙述者在对事件进行陈述时通过叙述话语或明或暗地传播了自己的态度和观点,使受众无形中受到引导,从而实现叙述者的传播意图。

传统文学叙事由于其艺术虚构性质和个体创作的方式,叙述者往往反映了作家个人化的思想倾向和意识观念,身份比较独立和自由。与此相比,电视新闻的叙述者不仅是对现实世界中真实发生的事件进行言说,受到一系列新闻传播规律的约束,而且叙述者作为大众传播流程整体意图和努力的最终呈现者,也受到从大的意识形态体系及权力机构到具体的媒介机构层层限制,为其代言和服务。叙述声音的个人风格可能因节目不同的类型而定位不同,但其本质上在表述电视传媒集体的立场及价值观方面是一致的。

电视新闻叙事主要通过声画的二元结构来组织叙事活动。电视的影音特性能够生动地传达自然和社会的各种信息,最大限度地接近人类在真实世界的感知方式,其形象性和真实感是单纯的文字、语言传播难以企及的。因此,电视新闻叙事最为突出的传播优势是在叙事中展示新闻现场的真实画面,传达原生态的生活场景。然而声画之间达到珠联璧合的完美境界往往只是一种理想,二者不同的表述特性及叙事效果形成了最终复合叙事的潜在冲突,尤其在叙事化发展趋向下,作为组织整体叙事进程的叙述声音与生动真实的场景呈现之间形成叙事困境。

(一)叙述声音与真实场景之间的配合问题

新闻叙事中最常用的两种叙述形式是概要和场景。概要指的是把一段特定的故事时间压缩为表现其主要特征的叙述文本,描述简练,信息密度大。场景是指故事时间的跨度与叙述文本时间跨度大体相当,描述详细,信息量小,但更加完整。一个基本的电视新闻叙事模式就是以承载叙述声音的话语为主线,主要表现为概要叙述,其中穿插若干真实呈现的场景叙述,对前者起到或佐证或补充或渲染的重要作用。叙事化发展趋向使彰显电视视觉优势的场景叙述日渐受到重视,然而场景选择与语言表述两者由于传播介质的截然不同,叙事效果也有很大差异,构成整体叙事的潜在冲突。

叙述声音与画面之间本身是一种互补的关系,画面尽管能够表现生动的场景信息,但叙述声音的作用在于可以将画面展示的内容进行定位、命名乃至于建构意义。首先,叙述声音通过将画面信息明确化、条理化而赋予其意义,使观众在观看电视新闻节目时有明确的意义框架及阐释指向,场景的信息被精心挑选并服务于叙述声音的表达;其次,由于叙述声音可以自如地跨越画面的限制,概述一些画面无法表达的信息,也可以人为控制叙事进程中的时序、节奏等要素,因此,画面传递诉诸视听的感性信

息与叙述声音传达的理性引导之间存在着尽力弥合以达到和谐的重要问题。

然而,一方面,语言有更大的自由度,可以清晰叙述事件的完整信息,而场景因为必须依赖摄像机对事件现场的影像记录,除了事先有很好的准备之外,往往不能完全准确地配合语言叙述。例如在报道已经去世的新闻人物时,由于没有本人的现场访谈画面,一般都以其同事、家人及朋友的回忆追述为主,辅以少量的资料图片和影像片断,而缺失了鲜活的场景支撑,叙述声音常常显得单薄、自说自话,难以感染受众。另一方面,尽管场景叙述形式带给观众文字语言所不及的视觉愉悦,然而,场景画面能传达出更多不确定的非语言信息,和有明确价值指向的语言表述之间往往存在着不那么和谐甚至是激烈冲突的地方。例如在报道某项政策给群众带来好处的消息,叙述声音体现的宣传倾向十分明确,语言流畅清晰,但场景呈现中受访群众拘谨的神态以及套话式的问答往往使传播效果大打折扣。当与叙述声音有背离的真实场景生动鲜活地展现在屏幕上,那么有着话语引导优越地位的叙述声音尽管还在继续,但已经无可避免地失落了本应具有权威感。

(二)多级叙述声音中的不和谐现象

在电视新闻叙事中,主持人、记者及采访对象三类不同身份的叙述者的叙述实际上构成了多级叙述声音。主持人的解说不仅仅只是与画面相配合地叙述事实,更重要的是在对画面进行解释和补充的过程中,以强烈的话语导向意识将画面内容加以深化,从而发表议论、抒发感情,最为鲜明地体现新闻主题;而采访对象的叙述主要是个人化的视角、具体化的语言,显得比较随意和零散;出镜记者的叙述则主要起到将二者进行缝合的作用,或是根据采访对象的叙述提供画面之外有价值的信息,或是配合主持人解说进行有引导性的概述。在电视新闻叙事中,多级叙述声音是通过选取能够集中、突出表达主题的素材,例如典型事件、代表人物等,再加以精心构思设计的后期编辑,最终尽可能地呈现为一个和谐整体。由于采访对象的自然生动、富有个性的同期声有着其他叙述声音不能比拟的真实性、感染力,是电视新闻叙事中的亮点部分,然而其视角的限制以及个人化立场,使其叙述声音与有着明确导向性和主题性的主持人叙述声音之间往往难以达到水乳交融的完美配合,常常出现不和谐现象。

事实上,过于突出主题的主持人叙述声音,虽然可视为对新闻事实的一种提炼、一种意义化过程,然而,它与采访对象的本身朴实真切的叙述声音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明显的裂痕,也就难以达到和谐一体的传播效果,影响了新闻专题报道的真实性和感染力。

(三)作为道德评判的叙事结尾

电视新闻叙事的传播效果绝不仅止于使观众了解事件本身的信息,由于叙述声音里隐含着价值导向,叙事的终极目的还在于传达了如何看待某一事

件或某一人物的主导认知倾向,进而对受众的观点和立场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电视传媒承担着宣扬正确的道德价值观,促进社会道德建设的社会责任,比起单纯的道德说教,寓教化于叙事显然更令人易于接受。从传播学角度看,受众一般对信息的开头和结尾部分印象较深,即劝服性传播理论中提出的“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前者容易引起受众的注意,后者则容易被受众记忆。因此,电视新闻叙事通常在开头部分以呈现实事或提出问题等方法吸引受众,而叙述者对事件和人物的态度和观点在前期叙事充分铺垫之后,往往形成总结式的道德评判,集中体现在结尾部分,使观众获得明确的道德启示。

然而正是由于叙事结尾承担着道德评判的重任,往往和整个叙事进程形成的叙事快感有潜在的冲突。“正如悲剧中的发现和命运的突变令人感到愉快一样,这一过程之所以会产生快感,是因为此时此刻,理性战胜了显然不合理性的因素,一切都重新变得清晰明了,重新回归其原属之地”^{[3]P28}。在观看电视新闻叙事历程中,人的理性经历了叙事曲折之后终于解开了谜底,这会自然而然产生一种了悟事物真相的欢悦感受,这是叙事快感的一个重要来源。由于叙事化的发展,电视新闻叙事不仅倾向于更多丰富的细节呈现和情感表述,而且叙述者通过对叙述视角及叙述语气的控制,使受众感知新闻事件或人物的心理距离日益拉近。受众跟随叙述声音的主导,在场景穿插展现中身临其境般地经历了事件发展历程或是人物的情感变化。在叙事结尾时,叙述声音先前所设置的一系列悬念得到最终解决,事件和主要人物得到一个交代,受众也从中获得水落石出的愉悦感,而这种因场景及情节的生动呈现而产生的叙事快感作用于受众的感性认知,往往冲淡了最终的理性道德评判。

二、文本层面:现代神话与原型话语的冲突

罗兰·巴特在符号学中提出了“神话”的概念,作为一种意义的构造方式、一种讲述,神话往往是人们广泛接受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巴特认为神话的原理“在于把历史改变成自然”^{[4]P115},通过对符号意义的人为转化,使人们对事物形成概念化的、符合社会意识形态的认识。电视新闻叙事在叙述新闻事件的同时也需要对形形色色的原始事件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条理化的诠释,这种诠释因电视传媒的广泛传播使电视新闻也成为神话的建构者。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神话也不断地在更新和变迁,时代潮流的发展催生出一大批属于现代社会话语体系的新神话。这其中,日积月累的电视新闻传播在建构现代神话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是人类无意识的深层结构,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是原型。“原型即领悟的典型模式,每当我们面对普遍一致和反复发生的领悟模式,我们就是在与原型相遇”^{[5]P145}。原型的根源是对人类社会心理和历史文化的一种反映,并且通过世代传承,沉积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叙事中的原

型话语由于具有这样一些固有的叙述模式或经典意象,能唤起人们的亲切记忆和定向联想,而为人们所易于接受。电视新闻叙事中也存在原型话语,一方面是由于原型会无意识地沉淀在新闻叙事中,另一方面,新闻叙事有意识地运用原型话语会取得吸引受众注意力和加深受众记忆的叙事效果。总之,现代神话与原型话语普遍地存在于电视新闻叙事文本的深层结构之中,深刻地影响着整个叙事建构及宏观传播效应。

(一)电视新闻叙事中现代神话建构着社会现实

在社会交往中,人们通过相互作用学习特定的行为规范以及情感表达规则,社会群体或个人就是这样建立起共识来解释他们对现实的经历,从而建构社会现实。在大众传播勃兴的现代社会里,大众传媒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社会中的家庭、学校、教会等组织,成为个人社会化的主要信息渠道。社会化是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适应并接受社会的文化,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除了掌握基本生活技能这些成人期之前属于初级阶段的社会化过程之外,更多的是成人更为深入地社会化的过程,包括继续学习新的文化知识,接受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不断更新的社会规范及价值观,以达到认识自我、适应社会需要的目的。英国文化研究派的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从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霸权”理论出发认为,文化接受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优势意识形态”,这种“优势意识形态”在通俗电视节目不着痕迹地被复制着,从而在不知不觉之中型塑了受众趋于同一性的思想观念。现代神话就是电视传播“优势意识形态”的一种典型表现,具有潜在的文化建构作用,对社会文化生活、人们的价值观念等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大量现代神话通过日复一日的电视新闻节目不断将价值取向和概念化认识藉由事件信息传播的途径注入受众的思想认识之中,常常作为一种社会共识为受众所了解和接受,从而建构了社会现实。

例如,在电视专题节目《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牛玉儒》中,报道了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拒绝为自己亲属走后门的事迹。解说对这一事件的背景情况进行了概要的叙述:牛玉儒兄妹6人,排行老三,7岁那年,母亲离开了他们,当时最小的妹妹牛宇红才刚刚6个月。后来牛宇红的丈夫下岗后,生活没有着落的牛宇红找到了最疼她的三哥请求给丈夫安排工作。然后是牛玉儒妹妹牛宇红的同期声叙述了结果:“他说这个事儿我真管不了,我都跟你说过”,紧接着是牛玉儒的妹夫的同期声叙述进行评论:“就他这个级别,我敢说,在通辽市我上哪个单位就一句话的事。我也不可能下岗待了11年,一个不管!”这段叙述通过三种叙述声音的不断推进,不仅信息交代完整,而且生动自然地以亲属的怨气间接表现了牛玉儒身为党员干部不谋私利的高尚品德。然而,从整个事件的表达意向来看,尤其是牛玉儒妹夫的叙述中,实际上存在一个清晰可辨的现代神话:

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提拔任命自己亲属,这才是一种合乎情理的行为。这个神话在当今社会中显然已经成为被广泛认可的社会共识,也因此,牛玉儒的“不近人情”的做法才彰显出他的不同寻常。这些形形色色的神话渗透在我们周围的话语体系之中,最终建构了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认知。

电视传媒不断地通过信息传播制造出各种现代神话,在构建社会现实、型塑受众观念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在这个复杂的制造过程中,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根据事实材料本身所具有的某些性质和条件来进行筛选,也就是常说的根据新闻价值要素来选择素材;二是根据传媒的意识形态指向决定以什么形式来展示这些素材。最终,电视新闻叙事通过对事实材料的精心选择以及对一系列声画符号的精心组织,不为人知地形成了各种现代神话,随着叙事讯息的传达,进入受众的思想意识之中。例如在报道先进人物时,几乎有一个共通的命题模式,即侧重表现人物废寝忘食、不顾病痛地工作和学习,并且都因为一心工作而对家庭和亲人不仅无法尽到责任,而且亏欠很多。常见的一组镜头就是在同事或被帮助的人动情地叙述了人物的先进事迹之后,紧接着是家人出面诉说人物多年来为了工作对家庭的亏欠,最后是人物自己面带愧色地表示不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等等。关于任长霞、牛玉儒的典型人物的电视专题报道都有这样的模式化描述。

在这些大同小异的叙述被多次重复之后,在受众观念意识里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神话概念,即:不惜损害身体健康才能取得工作或学习上的突出成就;先进人物献身事业的同时必然是以牺牲合格的家庭角色为代价。这一神话意义在电视新闻叙事的反复传播之后成为社会大多数人对先进人物的概念化的认识。

(二) 电视新闻叙事中的原型话语

相比之下,原型话语在电视新闻叙事中的表现更为复杂一些,它是藉由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而再现积存在种族记忆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唤起受众似曾相识的认同感。例如,在对灾难性事件的电视新闻中,与西方媒体将灾难性事件本身及其受害者作为报道主体不同,中国媒体一般以政府行为为报道主体,往往突出的是抢险救灾的英雄行为和“人定胜天”的动人画面,有学者认为“这种叙述模式复现的是历史积淀下来的英雄的叙事原型”^{[6] P229}。中国一系列古代著名神话,如“大禹治水”、“后羿射日”、“钻燧取火”等等都是表现灾难来临时救世济民的英雄叙事,这种“人定胜天”英雄原型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沉积在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中。当类似的情景出现,原型话语也就会自然重现,从而形成一种民族共有的、熟识的灾难认知模式。此外对政府官员的典型报道也往往沉淀了古代青天大人为民作主的传统原型意象,前文中的任长霞、牛玉儒的报道都有着这样共同的原型话语的浓重痕迹,报道中无一例外

展现人物一心为民的事迹、群众的衷心爱戴以及同事亲人的动情诉说等等。

2003年山东电视台播出一个获全国新闻奖的系列报道《热血丹心铸警魂》,反映了山东菏泽一名杰出的基层公安干警段金彪的先进事迹和优秀品质。报道的开头就是一段生动的新闻事件场景:粗心的市民忘带家门钥匙,而家中婴儿睡在床上,煤气灶上还煮着牛奶,有引发火灾的危险。身为110巡警大队长的段金彪接警后带领巡警及时赶到现场,并且亲自攀墙爬壁破窗而入,排除了险情。叙述声音告诉观众:“这样的事在段金彪22年的从警生涯中不知道发生了多少起”,“不论是擒凶斗顽还是抢险救灾,每逢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他总是冲在最前面”。段金彪的下属也在访谈中证实,无论是绑架或救火的生死关头,还是这类取钥匙的日常小事,他从不让手下的巡警去冒险,而是自己冲锋在前。段金彪对此的表述则是:“难道我的命就比普通民警的值钱吗?”这段叙事塑造了一个身先士卒、舍生忘死的感人形象,这个形象实际上来源于中国英雄的原型话语。中国古代传说故事中不乏这样身先士卒、爱护士兵的将领形象,无论是李广、岳飞等著名历史人物的民间传说,还是三国英雄五虎上将等冲锋在前、英勇杀敌的艺术形象,这些动人的故事中尽管人物的事迹不同,但个性特征上却有着显著的共性,并在长期的口耳相传中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原型。上述电视报道中的新闻人物段金彪,他的职业身份是公安分局副局长兼巡警大队长,与古代的将领身份有近似之处,同时由于新闻叙事中突出了他身先士卒、英勇擒凶的动人形象,英雄的原型话语从中自然而然得以重现,使受众有亲切之感,并且很容易按照原型话语的设定氛围接受新闻人物的优秀品质。

(三) 现代神话与原型话语的冲突

在电视新闻叙事中,现代神话与原型话语由于生成根源和表达指向的不同,并置于庞杂多元的新闻叙事文本中,很难协调一致。尤其是在电视这种视听多元素表达的视觉传播形式中,一些旧有的神话由于存续时间长、影响深远,已经成为一种顽固占据人们思想观念的原型话语,与更为符合新时期社会形势发展的现代神话之间往往会产生潜在的冲突。

以系列报道《热血丹心铸警魂》为例,段金彪在小到破窗入户大到擒凶斗顽的各种危险面前“身先士卒”的作风,在传统解读中是一种源于“将领”原型的英勇过人、爱护下属的精神体现。但也有不少年轻受众认为,段金彪这种做法虽然精神可嘉却并不值得提倡,因为他既不给其他干警锻炼的机会,也没有培养后备人才意识,是一种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同时从现代管理科学角度来看,他身为领导,主要职责应该更多地从团队建设以及机制完善的角度去处理事情,而不是事必躬亲地冲锋陷阵,以这一标准来衡量,段金彪未能充分发挥指挥者、管理者的统筹作用。可见在今天,这一报道中的原型话语承

载的古老意义与一些属于现代神话的观念认识之间已经产生了尖锐的冲突。

又如在任长霞、牛玉儒的典型报道中,现代神话熏陶下的观众也往往会对传统的青天叙事模式进行反解读,追问机制层面的症结。任长霞上任伊始就不顾威胁打掉了长期盘踞在登封市造成百姓极大危害的黑势力团伙,这一事件在报道中由解说声情并茂地表述为“无私无畏,智勇双全,任长霞以一个人民警察的一腔热血和慧心义胆誓保百姓平安。在她担任登封市公安局局长3年零3天的短暂时光中,她带领民警打掉了20多个涉黑涉恶犯罪团伙,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000多起,用40岁的生命谱写了一曲人民警察为人民的时代颂歌”。报道在赞颂任长霞的同时精心塑造了一个青天式的原型人物,然而不少观众却产生疑问:登封市在任长霞上任之前为什么治安如此恶劣、黑势力如此猖獗?为什么不追究前任领导的责任?牛玉儒就任包头市市长时承诺让受灾群众尽快住上新房,包头市政协副主席对此的叙述是:“平均每平米大概降了350元左右,光这一块儿就让了40个亿,你们想想,40个亿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牛玉儒要是不让这块儿,搞城市建设,包头是个什么样,能干多少个形象工程呀!让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尽快住上房子,一切真正体现了用现在的话讲,‘以人为本’。”这番话对牛玉儒心系百姓的青天行为作了生动的注解,然而其潜在的预设无疑是领导干部在调度政府资金进行项目建设方面有着几乎不受控制的权限,这正是形象工程涌现的根源青天原型的叙事突出了个人的精神形象,而重视管理体制的现代神话则更多地关注机制因素。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身处社会转型期的受众接受着越来越多的现代神话赋予的新观念、新思维,电视新闻叙事既承接维系文化传统的原型话语,又向着变动不居的现实生活开放,致力于构建适合社会发展的现代神话,二者的潜在冲突必然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延续。

三、机制层面:社会职责与消费逻辑的冲突

电视作为大众传媒,一方面,它承担的首要社会职责就是监测环境,即要及时、全面、客观、准确地向社会及公众通报新近发生的事情和变化趋势,包括国内外大事、国家方针政策、社会热点焦点、重大突发事件,甚至是负面消息,为公众提供预警;同时电视还承担着通过信息传播实现整合社会协调关系的社会功能,这些社会职责具体体现为传统的电视新闻理念。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电视的产业属性得到越来越充分的挖掘,以市场需求为驱动力的消费逻辑开始进入电视新闻传播理念,表现之一就是愈演愈烈的叙事化趋向。电视新闻既承担着固有的社会职责,又在叙事化发展趋向受到消费逻辑的影响,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诉求往往存在难以调和的潜在冲突。

(一) 功能性需求与消费性需求的冲突

从传统理论上说,电视传媒的首要身份是“社会

公器”,即它不是某个私人或某个团体的私有物,应该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以维护整个社会的有序运行、推动社会良性发展为已任,这是电视理应承担的社会职责。然而作为市场主体,电视传媒又必然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是电视产业的内在消费逻辑。作为电视传播流程出发点和归宿的受众需求,既是电视履行社会职责的服务对象,也是电视消费逻辑指向的目标市场。受众构成的庞杂性和时空因素的变化,使受众需求表现为一个多层次多侧面、不断变动的立体化体系,大致可以划分为对应于“硬新闻”的功能性需求与对应于“软新闻”的消费性需求。社会职责和消费逻辑两种不同的传播理念分别对应的是受众不同层面的需求。传媒承担的这种双重身份角色其实在大众传媒发源地的美国由来已久,“履行经典的意识形态工具的职责与事实上激烈竞争之中追逐并保持市场份额与利润,是传媒与文化市场必须扮演的双重角色:一方面是社会责任,一方面是市场份额”^{[7]P90}。亨利·鲁斯用“教堂”与“国家”两个词汇分别指称传媒的编辑权和经营权,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美国新闻界,教堂是崇高的、精神的,而国家是世俗的,新闻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社会责任,其次才是市场利润。在“教堂”与“国家”有明确分别的年代,新闻工作者以一种精英启蒙的立场将受众定位于公民,着眼于公民“知的权利”以及尽力促成公民自我管理的监测环境功能,也就是强调了大众传媒要为社会和公众服务的责任和功能。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传媒市场化浪潮席卷美国,原有的“教堂”与“国家”有着严格划分的传媒理念被消费主义的市场理念所取代,随之而来的就是功能性需求与消费性需求原有的平衡受到了冲击,中国电视新闻随着传媒改革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

社会职责理念认为电视新闻是“社会守望者”,代表公众行使信息获知权,及时传递现实社会的重要变动情况,注重满足受众的功能性需求,因此在叙事方面倡导以严肃的态度朴素记录新闻事实。消费逻辑理念则将电视新闻视为一种文化消费品,叙事中突出事件的人情味、趣味性,运用多种渲染细节、带有煽情色彩的叙事技巧,主要满足受众消费性需求。如果社会职责和消费逻辑所对应的电视新闻象早期关于硬新闻和软新闻的分类那样界限分明,那么就on能够很好地满足受众的多元化需求。然而,电视传媒在经济体制转型的今天,必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争夺生存空间,同时占领优势市场就意味着电视媒体利润、规模的快速增长,危机与诱惑并存的双重压力使消费逻辑理念渐渐有压过社会职责理念的趋势,电视新闻越来越强调贴近性和世俗化。叙事化发展趋向在电视新闻中日益盛行,使得硬新闻转向软化,新闻告知转向新闻叙事。因此,功能性需求与消费性需求常常难以区分,从而产生潜在冲突。

(二) 公共资源与市场主体的冲突

近几年,电视荧屏上民生新闻风行一时,民生新

闻关注民情、民意,聚焦社会热点、难点,彰显服务民生、以人为本的传播理念,受到观众的广泛欢迎。然而民生新闻在贴近民众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出现了平庸化、琐碎化、娱乐化、同质化等问题,究其因,这类民生新闻往往把目光停留于家长里短、街头巷尾的单一式报道,如对小区垃圾占道、街道污水横流、邻里的纠纷等报道,属于一个个孤立的、浅表的事件,没有与社会发展体制性普遍性问题相关联,也就无法对广大民众的现实生活提供更为有意义的参考。例如成都电视台的《胖姐帮忙》节目主要内容就是主持人胖姐对拨打节目热线电话的市民提供帮助,所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家庭纠纷等琐事,电视镜头将整个帮助过程从胖姐与市民见面开始直到最后事情结束的全部情况几乎都原原本本地摄录下来,呈现给观众,大量原生态的市井场景及粗俗的吵骂甚至互相撕扯都进入了电视传播之中。不仅占用了宝贵的媒体资源,而且如布尔迪厄所言,它转移观众的注意力到无价值的事物上,对于社会发展和公共文化建设都将产生消极的影响。

社会职责理念把电视传媒视为一种公共资源,奉行两大传播理念。一是传播尽可能多的新闻信息。电视新闻每天播出的容量是有限制的,资源十分宝贵,因此衡量电视新闻的基本尺度之一是有有效信息量,即报道中包含多少新闻事实或受众关心的信息。电视新闻也历来追求简明扼要、迅速及时地传播重要的事件信息。消费逻辑将电视传媒当作市场主体,电视新闻开始叙事化发展,追求以故事讲述的形式进行新闻传播,不仅注重事件信息的首尾完整、脉络连贯,而且追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叙事效果,这使以往处于从属地位的事件细节得以充分展现,甚至人为制造波澜,拉长情节。这样一来,电视新闻单位时间内传播给受众的有效信息量急剧减少,无形中浪费了社会公器的宝贵资源。二是传播重要的新闻信息,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提出了“新闻洞”的概念,认为进行新闻报道是在一定之规的封闭系统中的强迫选择,“所有这一切反映在新闻洞里,新闻洞能自然而然地反映出社会注意事项的轻重缓急”^{[8][9]}。李普曼在其代表作《舆论学》中也提出了大众传播在现代人和现实环境之间建构“拟态环境”的重要作用。现代人正是依赖媒介建构的这一“拟态环境”获得对现实社会的整体认识。作为大众传播的“把关人”,电视新闻从业者必须将精心筛选的按重要度排序的新闻事件报告给受众,为受众提供一个尽可能接近真实环境的“拟态环境”。然而,新闻事件的重要性与其故事性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衡量标准,二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叙事化发展趋向,以往占据绝对优势的重要事件渐渐让位于一些无足轻重但离奇曲折的事件,电视新闻变得琐碎化、零散化,造成“拟态环境”偏差严重。

(三)整合社会协调关系和追求矛盾尖锐化的叙述困境

传播学先驱者之一的美国著名学者拉斯韦尔早在1948年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就指出大众传播最重要的3项社会功能:监测环境、协调关系和传承文化。其中,协调关系功能要求大众传媒不仅只是传递现实信息、提供事件情况,还必须通过对事实信息的选择性传播以及发表言论等方式协调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分散个体联结为有机整体,达到整合社会、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目的。人类社会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和发展,就需要社会成员对该社会有一种共识,也就是对客观存在的事物、重要的事物以及社会事物的各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要有大体一致或接近的认识。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人们的认识、判断和行为才会有共通的基准,社会生活才能实现协调发展。建立社会共识以及协调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团体之间的关系是传媒的重要社会职责,大众传媒在传播新闻信息、实现监测环境功能的同时还必然渗透着观点、意见等对于新闻事实的解释及评论的倾向性信息,这些倾向性信息在建构受众对于现实情况的认识以及特定观念有着强大的力量。因此,不同于普通人私下发表言论的自由随意,拥有巨大影响力及话语地位的传媒在表述对事件的认识、观点及意见时,必须考虑话语信息对公众的社会效应,要承担整合社会、协调关系的神圣职责,如果只图一时之快或个人意气发表偏激、片面的错误言论,往往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2007年1月,央视著名主持人李咏由于在一次节目中为调动现场气氛自编了“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懒汉高唱秦腔”的话,引起广大陕西观众的强烈不满,认为是对陕西人的贬低,姑且不论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从中可以充分看到电视传媒信息传播的公开性、权威性。因此,发表言论必须注重社会影响以及舆论导向,这其实就是协调关系的功能体现。

然而,在新闻叙事化的发展趋向,追求矛盾冲突尖锐化的叙事走向与传媒原有的协调各方关系、进行社会整合的职责之间往往会产生激烈冲突。例如,2007年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民事案件,却以其敏感因素轰动了全国,引起了激烈的舆论反响。此案真相已经难以还原,可以确认的事实是:2006年11月,等公交车的徐老太在上下车的拥挤人群中摔倒,第一个下车的彭宇将其扶起,徐老太指控彭宇为将其撞倒的肇事者,要求他承担医疗费损失费10多万元,而彭宇声称自己只是好心帮忙,法院依据“推理分析”和“公平责任原则”判决彭宇补偿徐老太损失的40%,彭宇事后投书当地媒体称自己好心反被诬。此事在媒体曝光后,舆论大哗,在各媒体对此的标题上可以看到在这个案子上基本都站在了彭宇的一边:

齐鲁晚报:法律不能逼人当“小人”;

云南日报:武断的“常理”让人胆战心惊;

南方网:男子称扶摔倒老太反被告被判赔4万;

成都日报:扶人却被判撞人赔钱 南京小伙好心

没好报;

新华网:见人跌倒你别扶;

人民网:“我”为何当“看客”?法官怎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光明网:法官“合理想象”犯罪贻害无穷;

大江网:摔倒的行人千万不要扶?法官所指的“情理”是歪理;

海都资讯网:老妇摔倒你还敢不敢扶;

新浪网:男子扶起摔倒老太反被告、帮人反被法院判赔4万?彭宇:以后还有谁敢做好事;

江苏电视台:蹊跷的索赔;

凤凰卫视:文涛拍案之彭宇案:好人真的难做。

这一事件如此轰动与其本身的一些戏剧因素有关联,如:徐老太的儿子是公安人员,法院的判决中不是运用为人熟知的“无罪推定”而是依据“常理判断”、当事人的原始笔录缺失等等,都能引起人们更多的遐想空间。但纵观媒体对此事的报道立场,不是去客观探究案件本身在审理过程中的问题以及如何去克服、纠正司法中存在的弊端,而是惊人一致地集中于道德层面的质疑,从标题到内容都突出“好心反被诬”这样一个富有戏剧性和道德煽动力的故事核心。不可否认,经过这样提炼处理的新闻报道由于将矛盾尖锐化,具有极强的戏剧张力,自然更容易吸引受众的关注。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由于单纯强调了事件中道德层面的对立冲突,迎合了在现代许多我们熟悉的潜在的社会情绪:对司法机构执法不公的不满、对道德人心沦丧的不满以及对不公平的社会潜规则的不满等等,结果不仅没有起到整合社会、协调关系的重要作用,反而导致更为偏激

的社会心理倾向,并不利于现实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进步。

综上所述,电视新闻叙事化是一种新兴的电视现象,也是迅速蔓延普及的一种电视新闻新理念。叙事化趋向使电视新闻面临多层面的叙事困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这些潜在冲突还会继续存在。要正确看待这一发展趋向,就必须对它所带来的各方面影响有深入的认识,而如何更好把握这一发展现象以及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找出应对之策,值得进一步思考。

参考文献:

- [1]李希光.新闻学核心[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
- [2]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3]J.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M].申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4]罗兰·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选[M].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
- [5]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6]曾庆香.新闻叙事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
- [7]吴飞.传媒批判力[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 [8]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M].梅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A Study of Narrative Plight of TV News

OUYANG Zha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P. R. China)

Abstract: There must be potential conflict between the tendency of narrative development of TV news and the inherent attributes of news and the TV spread, causing narrative plight of TV news. This paper attempt to analyze the narrative plight by three levels, study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narrative voices and scenes show on the first level named symbols; analyz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model myth and prototypal discourse on the second level named text; discuss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nsuming logic on the last level named mechanism.

Key words: the tendency of narrative development; TV news; potential conflict

(责任编辑 彭建国)